



清朝陪都“盛京”沈阳故宫内的“大政殿”

■南北平衡型“两京制”——
明设南京为陪都
清设“盛京”为陪都

公元十四世纪下半叶，中国进入了短暂的混战期，元末农民起义接连爆发。元至正二十八年（公元1368年）正月，朱元璋在今南京即帝位，易名“应天府”并定都于此。

朱元璋（太祖）十分看重都城建设。早在洪武元年（公元1368年）八月即设开封为陪都（行在），称为“北京”，一度欲迁都于此。

后来，又派太子朱标前去汉唐都城所在的关中勘察。朱标回到京师后“献陕西地图”，后因朱标早逝，建都关中的设想作罢。

朱标长子朱允炆（建文帝）当了皇帝后，燕王朱棣（成祖）发动“奉天靖难”。朱棣当皇帝当年（1403年）正月，即设北平为陪都，改称“北京”，改京师为“南京”。

永乐四年（公元1406年），朱棣下诏迁都北京，遂开始全面营建北京城。永乐十九年（公元1421年）年正月正式迁都北京，设南京为陪都，形成了南北“两京制”。

明朝虽然还有中都临濠，但那是到明亡都未建成的一座废都。最搞笑的是，中都后来变身“皇家监狱”，凡皇族有罪之人均发配于此“劳改”。所以明朝是名副其实的南北平衡型“两京制”。

清朝也以北京为首都，实行南北“两京制”。不同的是，清朝陪都在东北，即被称为留都的“盛京”（今辽宁沈阳）。因此沈阳也有一个故宫，原名“盛京宫阙”，后称奉天行宫，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明清旧城中心。沈阳故宫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，现有建筑90余所，300余间。沈阳故宫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，初成于清崇德元年。清顺治元年，清朝移都北京后，沈阳故宫成为“陪都宫阙”。

解析：明清时期，是中国古代都城南北平衡型“两京制”流行时期，之所以称之为“平衡型”，是这种一北一南的双都模式中的陪都，已不再有东西控制型双都模式中的同等地位，陪都的政治分担功能弱化，政治象征意义突出。如朱棣称帝后的南京，虽然有完整的机构，但实际上已流于形式。

十四世纪以后，乃至更早点的宋元以后，东部沿海发展加速，海外因素影响加大。中国不稳定因素和护疆压力，由过去主要来自西北、北方，变成来自北方和东南方。明清两朝皇帝都继承了过去“天子戍边”和“都城镇国”之传统，都城实行南北“两京制”显然是一种明智之举。



沈阳故宫文溯阁的四库全书

□ 综合中新社

近来，有关中国将建政治副中心的话题被炒得火热。所谓“政治副中心”，即古代的“陪都”。

陪都的地位仅次于首都，古代是如何选择陪都的？这里选几个典型朝代，来尝试解析一下。

中国古代如何选择“陪都”

■东西控制型“两京制”——
两汉时期
长安与洛阳的角色互转

汉朝是刘姓王朝，有刘邦（高祖）建立的前汉和刘秀（光武帝）建立的后汉之分，后世史学家习惯将前汉称为“西汉”、后汉称为“东汉”，此叫法即因各自都城方位不同而来。

公元前206年，刘邦受封“汉王”。在“楚汉相争”中，刘邦打败了项羽，于公元前202年定鼎天下。当年2月28日，刘邦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，定国号为“汉”。初都洛阳，群臣拥护，认为“其固足可恃也”。

但不久，刘邦改变了想法，将洛阳设为陪都，而定长安城为首都。原来，谋臣张良的分析起了决定作用。《汉书·张良传》记载，张良认为洛阳“其中小，不过数百里，田地薄，四面受敌，此非用武之国”；长安则“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”。

到了建武元年（公元25年），洛阳终于迎来转机，由“著名陪都”转正为东汉的“著名首都”。这年冬十月，刘秀与王莽的政权决裂，在鄗（今河北高邑）登基称帝，为表明自己的刘姓正统和汉家重兴，仍以“汉”为国号，此即东汉。

刘秀确定洛阳为首都（东都）后，设长安为陪都，称为“西都”。

解析：两汉都城，是古代中国都城制度中“两京制”的代表，进一步说是东西控制型“两京制”的代表。所谓“两京制”，就是设一首都一陪都，是古代中国前期都城制度的主体，其始于上古三代时的周朝，周前期以镐京（今陕西西安西南）为首都，另建陪都洛邑（今河南洛阳）。

刘邦设首都于长安，而立陪都洛阳，刘秀反其道而行之，长安、洛阳角色互转，这实际上是上古周朝实施的都城东进战略的继续。刘邦之所以选择长安作为都城把洛阳作为陪都，是因为当时秦朝的旧势力并未从根本上消失，都城设于秦朝旧都附近有利于稳定国势，传统的堪舆术上叫作“压王气，镇龙脉”；刘秀选择都洛阳而陪长安，是因为长安乃刘姓汉朝开基肇始之都，不忘旧都即不忘根本，这在讲究正统的古代是相当重要的。还有一个重要因素，关中的物产资源已不能够支撑首都长安的消费需求。

■“两京制”向“五京制”的转变——
唐肃宗设洛阳太原
凤翔成都四个陪都

唐朝（公元618—907年）诞生于武德元年（隋义宁二年，公元618年）农历五月，李渊（高祖）接受隋恭帝杨侗禅让称帝，定都长安。

长安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首都，但其功能和名称屡有更改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长安“初曰京师，天宝元年曰西京，至德二年曰中京，上元二年复称京师，肃宗元年曰上都”。

作为一国之都，长安为何名称有这么多的变化？这与唐朝在不同时期陪都的增减变化有直接的关系。李渊建唐后，初仿隋东都制，仍视洛阳为陪都，后于武德四年（公元621年）废东都。

洛阳的地理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，李世民（太宗）继位后，重新提升洛阳的政治地位，下令重修洛阳宫。到显庆二年（公元657年），李治（高宗）恢复隋制，重设洛阳为东都，正式赋予洛阳以国家政治副中心的陪都地位。

武则天（高宗皇后，大周皇帝）代唐自立后，洛阳的政治地位又一次被提升，光宅元年（公元684年），武则天易名为“神都”。天授元年（公元690年），

■环抱护卫型“多京制”——
北宋设“四京”
辽实行“五京”制

北宋的首都为汴州开封府，即今河南开封市，时称“东京”。宋初仍实行隋唐的“两京制”。

赵匡胤（太祖）即帝位后，设陪都西京，与东京相对应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北宋的西京并不是唐时的长安城，而是距宋祖陵所在巩义较近的唐东京洛阳。

此后，北宋又设立了南京应天府和北京大名府两个陪都。应天府和北京大名府，一南一北，故称“南京”、“北京”。这样，北宋都城实为“四京制”。

北宋时，南京的政治地位很高，是缘于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恭帝时领宋州归德军（今河南商丘境内）节度使，在境内的陈桥镇策动兵变，夺取帝位，史称“陈桥兵变”。赵恒（真宗）当皇帝时“思显先烈”，于景德三年（公元1006年）升归德军为应天府，大中祥符七年（公元1014年）升应天府为南京，成为陪都。

与宋一样，中国北方的辽、金，也实行了“多京制”。以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为例，前期以上京临潢府（今内蒙巴林

武则天正式称帝后改“唐”为“周”，干脆定洛阳为首都，长安反成了陪都；同时，再设武姓故里并州（今山西太原）为“北都”。

李隆基（玄宗）当皇帝时，改东都为东京，此时的长安相应称为西京。李亨（肃宗）当皇帝时，于至德二年（公元757年）设4个陪都，即东京洛阳、北京太原、西京凤翔、南京成都，此时的首都长安改称“中京”，唐朝形成了“五京制”的格局。

解析：在东汉以后，抬高帝王出身地（帝乡）和发迹处（龙兴之地）成为一种光荣的例行选择，于是在两京之外便多出了“一京”。唐朝集“两京制”和“多京制”于一身，是中国古代都城东西控制型“两京制”的成熟兼转型期。都城的安排和变化轨迹相当明显，由前期的“两京制”转向后期的“多京制”。这种转身是时局变化和加强统治的需要，说明东西控制型“两京制”已不再适合公元八世纪的中国。

唐朝以后，东西控制型“两京制”基本结束了使命，环抱护卫型“多京制”开始流行起来。

左旗境内）为首都。先设辽阳（今辽宁辽阳）为南京，后改为东京，重设幽州（今北京西南）为南京，称燕京；再设云州（今山西大同）为西京，又以大定府（今内蒙宁城西南）为中京，形成了各有分工，功能齐全的“五京制”模式。

解析：宋、辽、金时期，“多京制”开始大流行。多京制又叫“多都制”，在“两京制”出现的东周时期已出现。在封建时代，有两大时期流行多京制，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唐末到宋元时期。第一时期以曹魏为代表，有首都洛阳和长安、谯、许昌、邺城四个陪都。

无论是宋、辽、金、元时期，还是明清时期流行的南北平衡型“两京制”孕育时期，如金国和元朝都行多京制，但发挥作用的还是“两京”，如金的上京与中都，元的上都与大都，都是一北一南。

这一时期在都城史上的最大贡献，是当今首都北京的政治功能和地位被发掘了出来，此后以北京为首都的南北平衡型“两京制”成为主流。